

揭开印刷术发源地的神秘面纱

——评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

王 国 强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一直为众多学者探索之题。从东汉开始,直至宋代,其间的每一个朝代都曾被不同学者指陈为印刷术起源的时代。近半个世纪来,“唐代说”脱颖而出,影响甚广,许多教材和论著竟倡此说。然而,“唐代说”先天不足,或似是而非,或咬文嚼字,或捉襟见肘,或浅尝辄止,它无法回答来自不同方面的诘难,在众多的问号面前显得苍白无力。显然,原有的“唐代说”,就严格的学术意义而言,是无法成立的。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时间仍是一个不解之谜。那么,能不能产生出一部著作,哪怕只有一部,把已有的成果加以总结,对纷纭的学说予以清理,以新的方法和材料,得出令人心服口服的结论呢?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曹之先生所著《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正是这样的一部著作。该书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以新的思路和研究方法,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唐代说”,使“唐代说”建立在科学而坚实的基础之上。这是一部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总结性著作。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共分12章。前10章从社会需求、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三个方面论述了雕版印刷术的起源;第11章论述了泥活字、木活字和铜活字印刷术的起源;第12章论述了套版印刷术的起源。全书43万字,86幅插图。

以崭新的思路展开论证,是该书的第一特点。印刷术的产生绝非是偶然发生的事件,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作者认为,研究者应当广开思路,把印刷术的起源放到历史的大气候中考察,这可以称作“大印刷史观”。所谓“大印刷史观”,就是把印刷术的起源看作一个综合的文化现象,看作社会的、技术的各种因素激荡相生的过程和结果,避开单层次的叙述、片言只语的记载或难以

成为论据的文字陷阱。这种思路是印刷术起源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突破,它可以指引到达终点的基本途径。的确,当我们以新的目光来审视某一不成问题的问题时,往往会发现其中的破绽。建筑在沙土上的大厦毕竟容易倒塌。旅居美国的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倡导“大历史观”,令人耳目一新。曹先生以其多年的研究心得,提出了“大印刷史观”的新思路,并率先垂范,无疑开辟了人类研究印刷术起源的新天地。

正是在此基础上,曹先生新创了研究印刷术起源的一整套科学方法,这构成了该书的第二特点。在基本的方面,作者把理论分析、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广开思路,上下古今,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尤其是理论分析方面,曹先生发前人所未发,独创了一系列的研究方向。

曹之先生认为,理论分析离不开社会需求、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社会需要是发明创造的客观要求,作者进行了较充分的论证,这些社会需求是:(1)著者需求,即著者希望以最快、最好的方式把作品公诸社会,以存久远。(2)读者需求,即读者希望社会提供大量的图书复本,改变自己抄书的现状。(3)抄书者需求,抄书者希望尽快摆脱抄书之役,从书坊中得到解放。(4)书商需求,即书商希望社会提供取之不尽、物美价廉的图书商品,繁荣图书市场。(5)藏书家需求,即藏书家希望不断补充家藏,增加品种与数量。(6)外交需求,即一些民族和国家要求进口更多的中国图书,扩大友好交往。(7)佛教需求,即善男信女要求用最先进的手段复制佛经、广积功德……这一切社会需求到了一定的时候,都会千呼万唤新的图书制作的方式。所谓“物质基础”,是指发明创造的物质前提,主要指纸、笔、墨等,雕版印刷术必须等到

这些物质制造技术发展相当阶段时才会出现。所谓“技术基础”，是指发明雕版印刷术所需要的各种技术。该书概括为：刻字技术，印刷字体的选择，反文阳刻技术，印刷技术。这是一个逐步产生、发展、完善的过程。从来没有哪一部书像本书这样详细系统。

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对于论证印刷术的起源十分重要。曹先生不仅对于大量的文献记载进行排比、分析，而且对于那些隐隐约约、若明若暗的文字进行钩玄索隐，对于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记载，加以鉴别、考辨，显示了文献史家沉稳谨慎的风度。本书第9章第2节用5种表格列举了2000多年来古籍的发现和出土情况，曹先生写道：“如此悠悠的岁月，如此茫茫的大地，如此密密的墓穴，如此频频的机会，都没有发现一件西汉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印刷品，这决不是古墓的吝啬、历史的偶然，它向人们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唐代以前确实没有发明雕版印刷，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非唐代莫属。”的确，出土文物以无声的语言向人们宣告了一个有力的结论，它远远胜过千言万语，万语千言。

如果把上述内容看作研究印刷术起源的物证，曹先生还密切注意到了大量的旁证。这些旁证的出发点是：印刷术发明应用以后，必然给社会文化界，尤其是文献界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社会效果），例如私人藏书、书目编纂、官方赐书、书业贸易、图书亡佚诸方面都会受到极大影响。通过宋代以前各时代上述内容的比较，使得“唐代说”的立论更加接近事情的真相，达到无懈可击的境界。本书的恢弘气势和谨严体例使它有资格根本不必理会可能会有某些具体方面的诘难，因为她是一个整体。

在具体研究方法上，作者除了利用常见的文献考证法外，还较多地使用了比较研究法，计量研究法等，使立论建立在准确的数据之上。据统计，全书的统计表格有20多个，《中国丛书综录》、俞剑华《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杨殿珣《石刻题跋索引》等大型图书令人望而生畏，对其进行计量分析，当是电脑的事情，然而，作者竟然用手工完成了。为得到这些数据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是可想而知的。

《中国印刷术的起源》的第三个特点是披露了印刷术起源的大量的新资料。该书征引了众多正史、笔

记、诗文中的资料，且多未见于其他印刷史论著。这些新史料，不仅有助于本书的论证，也为今后关于印刷术起源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宝藏。诚如作者所言，他偏爱“竭泽而渔”的研究方法：研究问题，先把材料网罗无遗，然后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考证功夫。例如在研究“印纸”时，作者遍查《全唐文》、《全唐诗》、《新唐书》、《旧唐书》、《宋史》、《资治通鉴》、《全宋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还有唐宋杂史、笔记、别集，把唐宋文献中有关“印纸”的记载搜罗殆尽，然后着手分析研究。又如《汉书》、《后汉书》中关于帛书的记载，《晋书》以及南北朝九史关于纸书的记载，作者如数家珍，一一罗列。我曾设想，如果曹先生把搜集到的全部资料汇编为《中国印刷史史料》，那一定是斐然可观的。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开拓，作者才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是该书的第四个特点。通过科学分析，本书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大到印刷术的起源时间，小至某些具体问题。例如，一般认为拓印技术起源于南北朝或隋朝，作者则从训诂、著录体例、石经的流传等方面认为此说不可信，而直至唐代始有拓印。又如《弘简录》是否“述而不作”，作者对“令梓行之”作了精密的考辨，从训诂、原始材料、文字同异以及唐代内府图书的制作诸方面分析了邵经邦氏《弘简录》关于“梓行”《女则》的记载不足为凭，其中作者运用校勘的方法，将《弘简录》同《新唐书》等进行比较，极富说明力。例如“唐初说”的另一根据是《云仙杂记》中关于“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像”的记载，曹先生力证《云仙杂记》乃是伪书，其自序、引书、内容等，都足见其伪，而且宋人载论咸备，铁案如山。这些看法是有说服力的，结论是可信的。

总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一书以其浓厚的学术色彩，把宏观研究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从大的体例构思，到具体问题的辩证，无不见出新意，作者既能继承已有的成果，更能匠心独运，绝不轻易苟同，披荆斩棘，绕开陷阱，显示出媚流俗的学术精神。而这种精神在当前的学术界是难能可贵了。

也许关于中国印刷术起源时间的争论仍将继续下去，但是论者要轻易绕过此书，那显然是难以为功的。